文化轉向與全球視野：近代臺灣醫療史研究的再思考*

Cultural Turn and a Global Vision: Reconsidering Recent Decades of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Treatment in Taiwan

蔣竹山 (Chiang Chu Shan) **

一、前言

1970 年代以來，醫療社會史受到學界重視，開始強調將醫學放在社會脈絡中考察，探究社會因素如何形塑醫療型態、知識內容與研究方向，也探討醫療機構、措施、政策如何與社會互動，造成怎樣的後果，將醫療史看做是歷史的一部分。醫療史在臺灣被視為是一個新興的學術領域，群體研究的特色相當明顯，從 1992 年發展至今已超過二十年。這個社群跨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中醫文獻及公共衛生領域。

研究課題可分為四個方向：中研院史語所的「醫療史主題計畫」、中研院人社中心的「衛生與東亞社會研究計畫」、陽明大學的「醫療史研究群的建構與發展」及政治大學文學院的「身體與文明研究」。這些社群關注的焦點各有不同，分別是視覺與醫療、醫療的物質文化、東亞的公共衛生、STS、身體史。但社群成員研究力強，成果豐碩。1992 年中研院史語所成立「疾病、醫療與文化」讀書小組，1997 年則改組為「生命醫療史研究室」，曾先後舉辦過「中國十九世紀醫療」（1998）、「潔淨的歷史」（1998）、「健與美的歷史」（1999）及「疾病的歷史」（2000）等研討會。此後，進行過「影像與醫療的歷史」主題計畫（2008-2010），並於 2010

年舉辦「醫療與視覺文化」研討會。主要關注的議題有：醫療圖像的知識、分類與觀看、圖像中的病人形象、圖像與醫學知識的建構、影像中的疾病與醫療、圖像與博物學交流、圖像與博物館展覽。近幾年最新的研究計畫為「醫學的物質文化；歷史的考察」（2013-2015），由李尚仁主持。此計畫主要研究傳統中國醫學與現代西方醫學的物質文化，分析生產、分配、交換與使用等物質文化重要面向，並探討中藥材、毒物、寄生蟲、奎寧等醫療物的生命史。

中研院人社中心有「衛生與東亞社會研究計畫」，此計畫曾於 2013 年 10 月舉辦「醫學史與醫學人文研究與教學」學術研討會。2014 年 8 月 14 日舉辦「二戰以後醫學發展的新趨勢」工作坊，討論議題有：非西方世界的現代醫療、洛克斐勒基金會在華的瘧疾防治、國際衛生史、香港戰後的肺結核預防、現代護理知識的跨界流動。2014 年 8 月 15-16 日則與中原大學醫療史與人文社會研究中心，合辦「生命醫療史與醫籍文獻」學術沙龍暨青年學者研討會，討論醫療史研究的多元視角、臺灣醫學史的回顧、日本醫學史教育考察及香港醫療史研究經驗談。

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與中研院合作推動的是「醫療史研究群的建構與發展」。這個計畫的活動以小

* 本文係 2016 年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主辦之「2014-2015 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之論文，全文三萬多字，受限於篇幅，刪節一半字數。另外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味の素』在東亞的生產、流通與消費（1908-1945）：一種全球史的取向」，蒐集全球史研究概況的執行成果之一。

** 作者為國立東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型工作坊為主，主辦過的活動有：「殖民醫學工作坊」、「看孕：產前監測技術的性別政治」、「熱帶神經衰弱或東方神經症？在華洋人的精神崩潰」、「全球健康 Global Health」、「神經衰弱的歷史：一個文獻回顧」、「日本帝國的金雞納樹移植與金雞納學發展（1912-1945）」等工作坊。政治大學人文學院於 2010 年 12 月舉辦的「身體、權力與認同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這是政大「身體與文明研究中心」的計畫成果之一。與會學者提交的論文不限於醫療史，談論身體的文化史居多。在上述醫療史社群的推動下，醫療史成為臺灣史學研究中相當獨特的一個領域。研究的主題也相當廣泛，既有傳統的中醫古籍與醫學理論的內史探討；也有比較偏向史學新趨勢的文化史課題，像是疾病、身體、藥與廣告、公共衛生、殖民醫療、醫療政策、學科發展、物質文化、圖像、醫學體制、醫生群體或國際組織等。

陳秀芬曾指出「關於中國與臺灣的醫療史研究的回顧論文，光是從 1992 年起至 2009 年至少有 26 篇，平均每年有 1.4 篇，充分反映了這段期間海峽兩岸醫療史研究的盛況」。¹ 東亞醫療史的研究成果，近來已經有相當多的學者做過介紹與評論，如杜正勝、李貞德、李建民、余新忠、梁其姿、飯島涉、皮國立、曹南屏、李忠萍等。² 儘管這些文章的回顧重點不同，但多數文章的焦點還是偏向通論、社會史或單一專史如疾病史的探討，少有從文化轉向與全球視野的觀點檢視近代臺灣醫療史的成果。

本文雖然是針對臺灣史的回顧會議而寫，但並不採取以往摘要式作法，而是將視野放在東亞醫療史的脈絡下進行探討。文中所討論的文章以近年來的新作為主，依不同主題做前後時序的延伸。近來有三本新著相當能

代表臺灣的東亞醫療史的具體研究成果，分別是范燕秋編的《多元鑲嵌與創造轉化：臺灣公共衛生百年史》（2011）、祝平一編的《健康與社會：華人衛生史》（2013）、王文基及劉士永編的《東亞醫療史：殖民、性別與現代性》（2017）。³ 本文無意全面檢討近年來的所有近代東亞醫療史論著，而是將重點放在文化轉向及全球視野的研究取向，檢視近代臺灣醫療史的研究特色。以下則透過三個面向來討論：新文化史取向、疾病的全球史，及藥物的流通與消費。

二、「文化轉向」後的醫療史研究：新文化史取向

新文化史研究中有關「文化相遇」(cultural encounters) 的概念是近來研究文化交流常被討論的觀點。有關這個課題，臺大歷史系陳慧宏教授有深入的討論。在〈「文化相遇的方法論」：評析中歐文化交流研究的新視野〉一文中，⁴ 她提出文化史研究的理論，認為近年來蓬勃發展的中歐文化相遇的研究，在過去與未來如何讓跨文化的研究豐富歷史學的方法論，不可避免的要從西方歷史學方法論的轉向文化史之取徑來作理解。其觀點可以用來討論近代東亞醫療史的跨文化接觸的課題，這不僅是涉及文化史的研究，也與全球史有關。所謂的醫療史的「文化轉向」，指的就是受到新文化史趨勢的影響，醫療史研究特別關注實踐、表象、建構、發明、物質文化及身體等概念。其中受到的理論與方法論的衝擊，又來自於傅柯 (Michel Foucault) 的影響最大。⁵ 以下則從五個部分探討醫療史的文化轉向特色。

1 陳秀芬，〈醫療史研究在臺灣（1990-2010）——兼論其與「新史學」的關係〉，《漢學研究通訊》29: 3 (2010.8): 19-28。

2 余新忠，〈中國疾病、醫療史探索的過去、現實與可能〉，《歷史研究》2003.4: 158-168；皮國立，〈探索過往，發現新法：兩岸近代中國疾病史的研究回顧〉，《臺灣師大歷史學報》35 (2006): 251-277；李忠萍，〈「新史學」視野中的近代中國城市公共衛生研究評述〉，《中國近代史》2009.8: 101-114。

3 范燕秋編，《多元鑲嵌與創造轉化：臺灣公共衛生百年史》（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11）；祝平一編，《健康與社會：華人衛生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王文基、劉士永編，《東亞醫療史：殖民、性別與現代性》（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7）。

4 陳慧宏，〈「文化相遇的方法論」：評析中歐文化交流研究的新視野〉，《臺大歷史學報》40 (2007.12): 239-278。

5 (英)彼得·伯克著，蔡玉輝譯，《什麼是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59-88。

（一）身體、健康與國族

Peter Burke 認為：「如果說新文化史中有這麼一個領域，今天正經歷著盛況空前，但在一代人之前，也就是 1970 年代，這幾乎是不能想像的，那麼這個領域非『身體史（history of body）』莫屬。」這個領域的重要推手之一的英國醫療史家 Roy Porter 亦指出：「人們對於這個主題的興趣之所以迅速升溫，無疑是受到愛滋病傳播的影響，因為這個疾病讓人注意到『現代身體的脆弱性』。」此外，身體史的興起與法國哲學家及歷史學家的傅柯（Michel Foucault）的一系列有關癲狂、診療、監控與性的研究有相當密切的關連。身體史是一種由醫療史延伸出來的次領域，是西方史學界的新文化史研究中的重要項目。美國的中國醫療史學者費俠莉（Charlotte Furth）曾寫過當前身體史研究的兩種取向是「再現」（representation）與「感知」（perception）。⁶

在臺灣史的身體史課題，除了傅大為於 2005 年的著作《亞細亞的新身體——性別、醫療與近代台灣》外，過往關注的不多。⁷ 近來則有學者從健康運動的角度探討日治臺灣戰爭期的健民運動，許佩賢的〈戰爭時期臺灣健民運動的展開〉即是一例。這篇文章收入在范燕秋編的《多元鑲嵌與創造轉化：臺灣公共衛生百年史》一書中，本書是近年來臺灣醫療史研究相當重要的成果。全書主題以臺灣為主，擴及東亞國家的相關發展。內容分為五部分，有東亞近代衛生、醫藥與疾病防治、戰爭與保健衛生、醫療衛生體系的轉化、戰後公衛體系的轉化。⁸ 其中，鄭根埴的論文分析日本統治下總督府「衛生警察」組織之演變及人事特性。范燕秋在導論點出本文有兩個重要意義，一是比較研究，日本殖民朝鮮時已經累積了統治臺灣的殖民地經驗，朝鮮衛生警察組織是特殊現象還是殖民地通例，是比較分析的重要課題。二從東亞殖民帝國的角度出發，透過衛生警察組織的長期演變，分析殖民統治思想的變遷。

許佩賢從體力的要求、健民運動的推進與學校衛生的配合三方面，考察殖民地臺灣在戰時體制下如何被捲入日本帝國人力資源的要求。文中提到，作為身體與時間近代化裝置的收音機體操，於 1920 年代後期與日本都市化進展同時出現，進入 1930 年代後，也開始引進臺灣。除了強調「健康」與「高級格調」之外，這體操有一大特色即是集團體操。之所以能夠普及開來，這一方面與都市化、產業化後的社會變化有關，民眾認同收音機體操所象徵的近代感，相信健康的身體可以透過鍛鍊得到，而主動參與；另一方面，國家的主導也有相當大的影響，這種活動大多由文教局、遞信部、臺北市、臺北放送局共同主辦，到了 1941 年則由皇民奉公會主導。⁹ 此外，社會上也出現各種健康宣傳活動。像是 1930 年代之後，臺灣也開始舉辦乳幼兒選獎活動。在社會事業體系下，辦理各種注重乳幼兒健康的活動，推廣乳幼兒健康診斷，或是幫忙母親解決育兒問題。許佩賢還特別強調，這 1930 年代出現的健康活動，看似透過媒體推動，其實背後有國家力量在撐腰。同種類型的活動還有戶外活動、登山、健行與溫泉利用。像是國立公園的規劃，也有提供民眾健全娛樂的目的。不僅媒體會宣傳，學校也鼓勵兒童、學生運動及登山以達到健身的目的。從這些活動可以看出民眾為這些健康宣導活動的接受度很高，由此可見民眾健康觀的改變。

根據這篇文章，許佩賢在 2015 年的專書《殖民地臺灣近代教育的鏡像：1930 年代臺灣的教育與社會》中有更進一步的論述，以〈做為機關裝置的收音機體操〉及〈戰爭時期的身體動員與健民運動〉兩章分別進行討論。¹⁰ 後面這章和原來的部分差異不大，變化比較多的是收音機體操。許佩賢借用了日本學界常用的詞彙「裝置」這概念來形容收音機體操，將收音機體操視為一種「機關裝置」。與其用這個詞，我是覺得還不如用「文化裝置」會更為明確，以考察其在殖民地臺灣出現的過

6 Charlotte Furth 著，蔣竹山譯，〈再現與感知：身體史研究的兩種方向〉，《新史學》10: 4 (1999.12) : 129-144。

7 傅大為，《亞細亞的新身體——性別、醫療與近代台灣》（臺北：群學出版社，2005）。

8 范燕秋編，《多元鑲嵌與創造轉化：臺灣公共衛生百年史》。

9 收入范燕秋編，《多元鑲嵌與創造轉化：臺灣公共衛生百年史》。

10 許佩賢，《殖民地臺灣近代教育的鏡像：1930 年代臺灣的教育與社會》（臺北：衛城出版社，2015）。

程，以及在殖民統治的近代化、國民化與戰爭動員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這部分還有一個地方值得提出討論的就是，作者在前言點出了過往研究這個課題的有高橋秀實的神奇的收音機體操研究與黑田勇的《ラジオ体操の誕生》，¹¹此外呂紹理在研究日治臺灣的時間觀念時也提到收音機對臺灣近代生活作息規律化的影響時，每日清晨播放的收音機體操。有關這個課題，近來還可以參考佐佐木浩雄的2016年新書《体操の日本近代》。¹²

祝平一編的《健康與社會：華人衛生史》書中也提到，衛生體制如何塑造華人社會中的身體與主權的概念。像是雷祥麟的文章分析了民國時期新設計的衛生餐檯與個人衛生杯在肺結核防治中，重新塑造了衛生習慣、身體與「個人」的概念。

（二）飲食與健康

近來研究者漸漸開始思考近代帝國的發展對國家的日常生活、社會組織及社會運動史的影響。有關日本帝國統治下的臺灣，可以從比較的觀點來探討殖民地的統治特色，例如技術、觀光及博覽會的課題。更可以從帝國的框架來探討技術與近代東亞發展的關係，例如：牛乳的使用、母乳甚至代用品豆漿的出現；日本帝國殖民地的蔗糖技術發展；又或者是肥皂、味素、農藥製造與在東亞的流通與近代日本化學工業也有密切關係。其中，飲食與健康的課題也可以放在商品與消費文化的脈絡下來思考。

郭婷玉的〈1930年代葡萄酒廣告的健康訴求與臺灣社會〉即透過葡萄酒廣告在日治臺灣廣告機制運作方式，以及廣告論述策略的健康觀進行分析，呈現出1930年代葡萄酒廣告健康訴求的社會意義。¹³作者的問題意識來自在閱讀《臺灣日日新報》廣告欄時，注意到葡萄酒廣告為有效推銷產品，相當注意國家政經政策轉變與社會潮流，某種程度地集中於傳遞健康相關醫學訊息，

將葡萄酒商品和「健康」劃上等號。這種關注廣告圖像的研究方式特別強調形象（image）的解讀，是新文化史常見到的研究視角。她認為1930年代臺灣社會受日本重視保健概念的影響，使得整體社會越加偏重健康形象，酒商於是透過廣告將葡萄酒塑造為「營養聖品」，目的在於趕上大眾消費熱潮，增加商品銷量。特別是，臺灣民眾原本就有將葡萄酒當治病、安產的習慣，如此才能如此快速地就接受廣告手法。

李力庸的〈食物與維他命〉則透過日記史料探討臺灣人的營養知識與運用。¹⁴作者早在〈殖民、營養與風尚：日治時期臺灣的大眾畜產飲食文化〉就指出臺灣的畜產開發背後，隱含著新時代的營養觀。〈食物與維他命〉一文以日記為研究對象，這也是近年來臺灣史研究的重點。探討的日記有《水竹居主人日記》、《灌園先生日記》、《簡吉獄中日記》、《黃旺成先生日記》、《呂赫若日記》及《楊基振日記》，關注的範圍從上層社會到一般家庭，展現了臺日不同身分、階層與生活場域的飲食內涵。透過這些日記，李力庸歸納出幾點可以探討的飲食與健康的課題，像是飲食與疾病的時代、地域性；被揭開的營養真相；帝國競賽影響下，臺灣人營養觀念的變化；時人對營養的運用與習慣變化。

以腳氣病為例，從1930年代日記來看，當時民眾對此疾病的認識以及醫生的診治已經有正確的認識。例如醫生會以穀皮治療豐原的地方菁英張麗俊，而簡吉在患腳氣病之後，不僅對糙米有好感，還覺得特別有風味。在營養知識的傳布上，透過林獻堂的日記可以看出。對於不識字的大眾，要接觸營養學的科學知識不容易，演講提供了吸取新知的機會。這種向大眾宣導營養的講座要從1930年代開始才較多舉行，舉凡愛國婦人會、同風會、役場與霧峰一新會都曾舉辦過相關講座。從講座內容來看，婦女與兒童營養的重要已經被強調。文中還提到維他命如何成為藥商開發的商品，並在主流報紙宣傳

11 黑田勇，《ラジオ体操の誕生》（東京：青弓社，2000）。

12 佐佐木浩雄，《体操の日本近代：戦時期の集團体操と〈身體の國民化〉》（東京：青弓社，2016）。

13 收入范燕秋編，《多元鑲嵌與創造轉化：臺灣公共衛生百年史》。

14 李力庸，〈食物與維他命：日記史料中的臺灣人營養知識與運用〉，收入李力庸、張素玟、陳鴻圖、林蘭芳主編，《新眼光：臺灣史研究面面觀》（臺北：稻鄉出版社，2013）。

促銷維他命治病的功效。像是1925年，《臺灣日日新報》就刊載一則「滋養強壯料中第一位」的丸兒屋商店肝油廣告，標榜肝油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維他命，對營養不足、虛弱及結核病特別有效。除了維他命的研究，牛乳與健康的關係，也是學者關注的焦點。這部分可參考陳玉箴的〈乳業發展與營養論述：日治時期臺灣牛乳消費文化的普及〉，文章主要從飲食文化的角度探討，提到牛乳的特性、乳業的生產經營、牛乳的消費與文明意義，及牛乳的營養價值。¹⁵

整體來看，這部分飲食、健康與醫療的課題仍有許多待開展的題目。像是目前學界對於日治臺灣營養知識的推廣認識不夠，有必要增加對日本食物史的新理解。日本很早就這一塊有深入的研究，像是荻原弘道的《日本營養學史》（1960）及昭和女子大學食物學研究室編的《近代日本食物史》（1971）。後者近九百頁，是目前所見近代日本食物史書寫最詳盡的一本著作，裡頭提到營養學的基礎研究、食物的衛生與公眾衛生及營養改善的實踐。分別觸及了以下課題：生化學與農藝化學、熱量代謝的研究、維他命的抽取與分析、食物添加物、經口傳染病與環境衛生、食物中毒、寄生蟲、小孩的飲食、學校營養午餐、日本營養學會的成立、營養士的誕生及營養學研究的體制。

如何研究日治臺灣營養與健康的歷史，報刊資料不可忽略，像是《臺灣日日新報》中就有許多日常生活史的材料。例如從1912年起，臺北就出現提供不以正餐為主的咖啡店及喫茶店。這些店家六點就開張，販賣的食品相當多元，有烏龍茶、紅茶、咖啡、牛奶、巧克力、可可、洋酒、日本酒，當然裡頭也有許多洋食可當早餐。洋食一道約五錢、咖啡一杯八錢、牛奶約七錢。這價錢和平價青年旅館差不多。據統計，這些地方的消費者大都是25至40歲之間的中產階級。關於早餐的理想樣式，1929年的《臺灣日日新報》甚至在報紙上提供營養食譜給大眾參考，像是有則報導說早餐應該吃甘藍汁（12卡）

及味噌（61卡）。

（三）醫生、醫病關係

雷祥麟對於中西醫論戰及近代醫病關係有深入的研究，其研究方法有STS的特色。〈負責任的醫生與有信仰的病人〉這篇文章追溯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中國現代醫病關係的誕生過程，始於傳統醫家的開業術與擇病而醫，終於西醫如何在傳統中醫主導的醫學文化中，為醫病關係樹立全新的責任、權力與信仰。¹⁶

有的學者則從病人的角度思考近代中國的醫療與身體，皮國立的新著《國族、國醫與病人：近代中國的醫療與身體》就是一例。¹⁷本書透過民國的幾位中上層（其實就是上層）的歷史人物：胡適、孫中山、魯迅、梁啟超、蔣介石，將病人放在中西醫療的實際場域中，他們的經歷與思想，對醫療、國民性的看法如何？其思想是否有一致性，還是有其他的呈現方式？

臺灣醫療史這方面的研究較為少見，以往可參考林昌華，〈「醫者」或「患者」馬偕：探討馬偕博士與疾病的糾結關係〉的研究。¹⁸近來則有賴郁君的博士論文「日治時期的臺灣漢醫藥」，本論文主要關注日治時期臺灣漢醫藥的發展特色。以往這方面僅有林昭庚、陳光偉及周珮琪合著的《日治時期之臺灣中醫》可參考，透過賴郁君博士的研究，我們有了更新一層的認識。作者關注幾個重要問題：1. 臺灣總督府的漢醫藥政策理念。2. 改制後的漢醫藥的發展方式與變化是什麼？3. 漢醫與殖民體制的公共衛生政策的關係是什麼？根據作者的研究，我們得知，對於防疫政策，臺灣總督府是採二元體制的方式。殖民者方面，是由警察、公醫；被殖民方面，則由地方保正、漢醫，兩方面相互配合執行。警察與保正是行政的協助，公醫與漢醫則是醫療的執行，形成中西醫配合的情況。所以，被殖民政府排除與污名化的漢醫在殖民政府防疫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此外，臺灣漢醫學除傳統漢醫學知識外，還利用當地的藥物資

15 陳玉箴，〈乳業發展與營養論述：日治時期臺灣牛乳消費文化的普及〉，《臺灣師大歷史學報》54（2015.12）：95-148。

16 雷祥麟，〈負責任的醫生與有信仰的病人〉，《新史學》14：1（2003.3）：45-96。

17 皮國立，《國族、國醫與病人：近代中國的醫療與身體》（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6）。

18 林昌華，〈「醫者」或「患者」馬偕：探討馬偕博士與疾病的糾結關係〉，《臺北文獻》180（2012.6）：209-243。

源，衍生出克服各種臺灣特有疾病的知識。有關這幾點，的確是改寫我們一般對日治時期臺灣醫療史的傳統刻板印象。¹⁹ 雖然論文中醫病關係非主要焦點，但在第四章〈日治前期漢醫藥的角色〉中有處理到臺灣民眾對西方醫療的觀點。

(四) 醫療與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史該如何研究，在西方已經有許多相關的討論，²⁰ 但中文學界有關這方面的討論並不多，可看出這是個還在摸索階段的領域。有關近代中國的日常生活史研究的討論，連玲玲的〈典範抑或危機？「日常生活」在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應用及其問題〉是必讀文章。²¹ 她認為從四個面向探討日常生活史對中國史研究的影響：一、誰的日常生活；二、邊緣人物的主體性；三、日常生活中的認同；四、再探傳統與現代的關係。她還提醒我們該注意：日常生活史是否能突破舊的研究框架，為中國史開出一條新路？那得看我們採取怎樣的研究途徑。如果日常生活史只專注於描寫中下階層的生活細節，殊難超越原有的研究架構，形成一新的典範。

日記是再現個人日常生活世界的一個窗口，這方面史料值得重視。近來，中國史方面已注意到日記的重要性，像是張笑川利用清末民初士人姚永概的日記，探討清末民初士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並重點分析日常生活中的心情調護與身體健康維護等內容。²² 他認為，在晚清桐城世家中，理學修養功夫依然得以傳衍，並被奉為靜心之道，在日常生活中發揮著維護心理健康的作用。遇到疾病時，姚氏家族一般會遵循傳統中醫的治療方法，但同時也會求助於西醫。通過分析日記中對大量日常患

病及治療行為的記載，作者認為，晚清民初時期西醫正逐漸深入中國社會，但同時中醫亦有市場，士人更多根據自身需要選擇醫療的處所。

同樣地，近年來日記史料的運用與臺灣史研究有密切的關聯，許雪姬在〈「臺灣日記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中已經點出日記資料的研究成果，像是社會史、政治史、精神史、音樂史、文學史、婦女史方面，有待進一步拓展的有生活史、性別史、文化史及政治史。²³ 事實上，日記中有許多地方可以用來研究臺灣醫療史，像是筆者在《島嶼浮世繪：日治臺灣的大眾生活》中提到的屈臣氏、肥皂、南京蟲的例子，就已經多次用到《吳新榮日記全集》及《黃旺成日記》。而2014年所舉辦的「日記與臺灣史研討會」，也有學者林丁國透過吳新榮的日記探討小鎮醫生的行醫記事，李朝凱則發表〈一家清潔，病毒不住：從《黃旺成先生日記》看家屋清潔與環境衛生觀的建立（1912-1925）〉。更早之前於2010年的日記研討會則有沈佳姍以《黃旺成日記》為對象，為文探討日治前中期臺灣的兒童疾病與照護，或者是郭侑欣以《臺遊日記》所研究的割臺前宦遊文人的養生觀與衛生知識。²⁴

(五) 衛生、出版文化與國族

閱讀史與出版文化是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強調閱讀的「接受」問題。閱讀史的界定一方面與寫作史區隔，另一方面又與過去的書籍史（書籍商業史、書刊檢查史）相比較。學者們強調注重研究讀者的角色，研究閱讀習慣的變化，研究印刷的「文化用途」。此外，除了印刷文化外，傳統中國的在印刷術出現前的寫本文

19 賴郁君，「日治時期的臺灣漢醫藥」（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所博士論文，2013）。

20 有關西方日常生活史與微觀史之間的研究概況，可見劉新成，〈日常生活史與西歐中世紀日常生活〉，《史學理論研究》2004.1: 35-47；John Brewer, "Microhistory and the Histories of Everyday Life," *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 7: 1(2010): 87-109。

21 連玲玲，〈典範抑或危機？「日常生活」在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應用及其問題〉，《新史學》17: 4 (2006.12): 255-282。

22 張笑川，〈《慎宜軒日記》所見清末民初士人的心性修養與健康維護〉，《歷史教學》2012.22: 12-18轉41。

23 許雪姬，〈「臺灣日記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灣史研究》22: 1 (2015.3): 153-184。

24 另外可見容世明，〈〈長與又郎日記〉的研究價值：臺灣醫療史與近代史的觀察〉，《臺灣史研究》21:1 (2014.3): 95-149；郭侑欣，〈晚清至乙未割臺前宦遊文人的養生觀與衛生知識——以蔣師轍《臺遊日記》為例〉，《臺陽文史研究》創刊號，(2016.1): 83-109。

化，亦可思考閱讀與書籍的關係。

過往的醫療史較少關注出版文化，近來這方面的研究有增多的趨勢，但還是以近代中國史的領域為主，臺灣史較少這方面的研究。雖然日治臺灣醫療史研究尚未有人探討出版文化，但已有人從遊記下手，探討醫學訪查的記憶。²⁵ 林淑慧近年來關注旅遊書寫，這篇文章以日治時期杜聰明博士的遊記《杜聰明博士世界旅遊記》為主要材料，分析旅外的體驗。作者認為其遊記不僅再現歐美醫學現代性，還隱含帝國與醫學的關聯。文章的寫作取向雖然是旅遊書寫的研究，但還是參考了過往醫療史研究中的相關題材，像是范燕秋、朱真一、許宏彬及雷祥麟的醫療史研究。²⁶

三、全球視野：疾病的全球史研究

全球史的概念如何對醫療史的寫作產生影響，Harold J. Cook 在〈全球醫學史會是什麼樣子？〉一文中提出了他的看法。Cook 認為如果我們借鑑全球史研究的一些方法，或許我們會開始思考應該從不同的角度來看醫學史這個課題。他認為關於植物學和醫學的資料，以及針灸醫術，都像商品一樣，也會沿著貿易路線從亞洲傳入歐洲。通過貿易公司和傳教機構促使人員、技術、訊息、商品甚至疾病的相互流通，這充分說明了史學全球觀的重要性，對其來說，國家與「文明」並非主角。²⁷ 全球史或者說是新全球史的挑戰不僅讓我們開始留心那些距離遙遠的人們是如何相聯繫的，它也要求我們注意到小區域的人們在不同文化與語言的條件下是如何相互影響的。最後，Cook 提到：「如果我們要嘗試在醫療史研究中應用這樣的方法該怎麼辦呢？」這或許會使我們看到一個比我們想像中統一的醫學文化觀更複雜的健康和疾病相互作用的模式。Cook 進而認為，

醫學上的哪些元素是具有傳播性的？哪些沒有傳播性呢？這才是我們研究的進程。Cook 的新全球史與醫療史的觀點對東亞醫療史有全新的啟發，這種研究取向或許是日後東亞醫療史研究者可以參考的地方。

（一）近來西方疾病的全球史課題

有關疾病的全球史，當前常見的課題有疾病的全球史、全球的公共衛生、跨國的醫療組織、職業公害等課題。此外，有的史家則探查水與健康的問題。Ronan Foley 的 *Healing Waters* 一書展現了醫療史家受到文化地理及愛爾蘭個案研究的影響，開始以全球的觀點，探查水與健康的關係。Foley 的興趣在人、地方與健康。本書認為愛爾蘭的物質與隱喻的治療景觀的建構，立基在水組織、健康與地方之上。隨之按時代探討的有：聖井、溫泉鎮、土耳其浴、流汗屋、海水浴及當代的溫泉浴場。²⁸

政治與疾病的互動也是學者關注的焦點，例如 Jennifer Brier 的 *Infectious Ideas*。本書認為 AIDS 及社會保守主義主導了 1980 至 1990 年代間的美國政治景觀，這觀念挑戰了傳統的說法。他融合了同性戀史、醫療史及性史的角度，來論述有關對 AIDS 的回應理應在最近的政治史研究中佔有一席之地。本書對於 AIDS 所進行的政治努力，在地方、國家及跨國的各方面上，進行了獨立又相聯繫的個案研究。同時，本書豐富的資料，對於醫療史、全球健康及政治科學而言，都是很好的引導。²⁹

醫學社群移民的問題也漸引起學界重視。例如 Greta Jones 的 1950 年代愛爾蘭醫學移民到美國的研究。19 及 20 世紀時，愛爾蘭向外移出了許多醫學畢業生，主要是往柏林及英國。之後，二戰是分水嶺，1950 至 1960 年代時，愛爾蘭的醫生轉向北美移民。美國醫學組織擔憂

25 林淑慧，〈醫學訪查的記憶：日治時期杜聰明歐美之旅的敘事策略〉，《台灣文學研究學報》21（2015.10）：1-38。

26 有關戰後的研究，另外可見張淑卿，〈臺灣護士形象的緣起與建構：以《護士季刊》為案例的分析〉，《長庚人文社會學報》8:2（2015.10）：257-299。

27 王淑民、羅維前編，《形象中醫：中醫歷史圖像研究》（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7），頁4-5。

28 Ronan Foley, *Healing Waters: Therapeutic Landscapes in Historic and Contemporary Ireland* (Farnham: Ashgate, 2010).

29 Jennifer Brier, *Infectious Ideas: U.S. Political Responses to the AIDS Crisis*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9).

這批人對醫療專業可能造成的衝擊，在 1950 年代，開始引介符合美國醫學教育標準的外國醫學校。這些新的移民的投入美國醫療體系導致許多問題，例如跨越疆界帶來的資格與價值認定的問題、美國崛起成為全球的醫療霸權、國家政府的介入，以及移民成為改變輸出國家的催化劑。³⁰

(二) 殖民醫學與現代性

以往近代亞洲的疾病研究課題大多是從社會史的角度來探討。近來則改從殖民醫學的角度重新省視帝國主義醫療。這可以日本學者飯島涉的研究為代表。他在〈作為歷史指標的傳染病〉一文中提到：「醫療以及衛生事業是推行殖民主義最重要的工具。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許多醫學家以及動物學家推動了傳染病以及熱帶醫學的發展，以此為基礎，在建立醫療、衛生行政的幌子下，殖民統治得以強化。包括日本在內的歐美各國均試圖對中國進行侵略，這也是帝國醫療強行進入中國的過程。為對抗帝國醫療，中國開始著手建立衛生事業，中國的衛生事業是在應對鼠疫流行的情況下建立起來的」。³¹

基本上，李尚仁、劉士永、范燕秋的研究方法也是採取殖民醫療的角度來探討近代中國或臺灣的公共衛生制度的建立經過。這些研究幾乎有一致的共識，那就是「在某種意義上，所有的現代醫學都在進行一種殖民的過程，他們追求的是對身體的壟斷權力」。這些研究提醒我們，若把「帝國」納入考量，我們就不會陷入以現代醫學為標竿而忽略帝國擴張的歷史脈

絡，進而淪入史學界早已避免的進步史觀，而做出偏狹的論證與評斷。³²

自 1970 年代以來，史家已經開始探查所謂的西方醫學、殖民統治與在地治療間的彼此關係，一般的關注焦點在於歐洲的統治範圍：印度與大英帝國是最好的範例。近來，這樣的研究取向有些改觀。Anne Digby 等學者編的 *Crossing Colonial Historiographies* 可做為代表。他們強調要將殖民 (colonial) 與在地的 (indigenous) 醫學歷史，放在一個跨國的 (transnational) 脈絡下檢視。這本論文集的作者強調「複數醫學」(plural medicine) 觀念的重要性，並主張將關鍵歷史放在印度及南非的脈絡下探討。³³

而 20 世紀初期作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的公共衛生發展亦可說是日本母國「新醫學」的移植。究竟這些西方醫學如何影響近代臺灣公共衛生政策的發展？近來一些殖民主義與醫學的研究成果頗值得我們借鏡，例如美國學者 William Johnston 及日本學者福田真人都於 1995 年不約而同出版近代日本結核病史的專著，這兩本著作都有相當大篇幅涉及國家醫學與疾病的課題。近來，Flurin Condrau 與 Michael Worboys 合編的 *Tuberculosis Then and Now* 也提出了有關當 WHO 在 1993 年宣佈肺結核成為全球危機後，肺結核史的研究變成醫療史新關注的問題。在書中，他們提出了新的視野，例如強調病人的經驗，公眾與活動者與反肺結核政策的合流特點。³⁴ 沈佳姍則有關於日治時期臺灣的防疫體系下的預防接種的系列研究，至今已經發表過有關細菌檢查、免疫醫學的發展及霍亂的研究。³⁵

30 Greta Jones, "A Mysterious Discrimination": Irish Medical E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50s,"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25:1 (April 2012): 139-156.

31 飯島涉，〈作為歷史指標的傳染病〉，收於余新忠編，《清以來的疾病、醫療和衛生》（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37。

32 李尚仁編，《帝國與現代醫學》（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8），頁12；李尚仁，〈帝國、殖民與西方醫學〉，收入王文基、劉士永編，《東亞醫療史：殖民、性別與現代性》。

33 Ann Digby, Waltraud Ernst and Projit B. Mukharji, eds., *Crossing Colonial Historiographies: Histories of Colonial and Indigenous Medicines in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0).

34 Flurin Condrau, Michael Worboys, eds., *Tuberculosis Then and Now: Perspectives on the History of an Infectious Disease* (Lond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10).

35 沈佳姍，〈日治時期臺灣細菌性免疫醫學發展之研究：從中央研究機構的制度面考察〉，《臺灣學研究》13（2012.6）：161-184；沈佳姍，〈針式預防注射在臺灣的發展：以1919年霍亂大流行時期為探討焦點〉，《臺灣風物》62: 3（2012.9）：75-99。

四、物質文化與全球視野： 藥物的流通與消費

醫療的全球史的另一項研究重點在關注植物、藥與商業的關係。這種研究手法不僅有全球視野，也帶有文化轉向特色。說到這種博物學與物質文化史的研究，就不得不提 Londa Schiebinger 與 Harold Cook 的貢獻：Londa Schiebinger 的 *Plants and Medicine*，以及英國醫學史家 Harold J. Cook 的 *Matters of Exchange: Commerce, Medicine, and Science in the Dutch Golden Age*，這兩位學者不約而同地都關注到物的流通、商業及醫學知識間的相互影響。近來，Harold J. Cook 延續他上本書的方向，在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的 2013 年的 8 月號，與 Timothy D. Walker 策劃了一個專號 “Mobilising Medicine: Trade & Healing in the Early Modern Atlantic World”。³⁶ Cook 在 “Circulation of Medicine in the Early Modern Atlantic World,” 一文提到，在過去十年，醫療歷史的脈絡研究，開始吸引了史家的目光。這些緣起於對構築早期世界史作品的物質與跨國文化興趣的增加。

Cook 還提到，近來在許多有關商品活動以及物品的全球化學術著作的基礎上，開啟了醫療史的新方向。許多英文著作將焦點集中在醫學知識的流通上。³⁷ Patrick Wallis 提出了到英國的醫療商品貿易的重要性。而 Karol Kovalovich Weaver 的 *Medical Revolutionaries* 則指出非洲對

大西洋世界的醫學知識的融合所產生的貢獻逐漸受到認可。³⁸ “Mobilising Medicine” 這個專號提供我們觀看醫療史一種新的視角。其中的作者都是對歐洲與大西洋世界的各區域學有專精的學者，但這回他們所關注的焦點在於大西洋世界的醫學的相互聯繫，但不意味有個明顯的疆界，因為大西洋世界只是其中的一個焦點，有時會跨越至全球的範圍。然而這樣的焦點也讓我們瞭解到區域間的民眾互動，是否是自由的、強制的或相互協商的。其目的在將這些集合在一起，以顯現環繞的大西洋周邊與民眾有關的醫療是相互混雜的，不僅受到歐洲人所去之處的歷史影響，也與歐洲本身的歷史有關。

他們認為醫療不僅只是一種觀念和實踐，也是那時商業與殖民事業架構中的一部分。就 Cook 而言，近世以來，西方人尋找有用的藥物驅使著無數的人與物在全球移動，此現象延續了數世紀。這種尋找有用物資在新的全球商業中扮有重要地位。在探尋香料與醫藥的過程中，促使歐洲人與大西洋邊緣的人們有了進一步的接觸。當他們在進行醫藥交換時，一些像是新世界的外科與新奇資訊的革新，也同時出現。這種交換線路的連結造就了大西洋商業，使得歐洲的船隻不僅載送著人與貨物，還運送著知識到各處。³⁹

類似的物質文化的研究還可以參考顧雅文有關金雞納樹及張素玢的海人草與日治臺灣的寄生蟲防治。⁴⁰ 顧雅文的〈日治時期臺灣的金雞納樹栽培與奎寧製藥〉即

36 這篇文章分別是：Harold J. Cook and Timothy D. Walker, “Circulation of Medicine in the Early Modern Atlantic World,” Renate Wilson, “Trading in Drugs through Philadelphi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 Transatlantic Enterprise”; Londa Schiebinger, “Medical Experimentation and Race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Atlantic World”; Pablo Gomez, “The Circulation of Bodily Knowledge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Black Spanish Caribbean”; Timothy D. Walker, “The Medicines Trade in the Portuguese Atlantic World: Acquisi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Healing Knowledge from Brazil (c. 1580-1800)” .

37 Harold J. Cook, Timothy D. Walker, “Circulation of Medicine in the Early Modern Atlantic World,”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26:3 (May 2013): 337-351.

38 Karol Kovalovich Weaver, *Medical Revolutions: The Enslaved Healers of Eighteenth-Century Saint Domingue* (Champaign,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6).

39 Harold J. Cook and Timothy D. Walker, “Circulation of Medicine in the Early Modern Atlantic World,”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26: 3 (August 2013): 337-351.

40 顧雅文，〈日治時期臺灣的金雞納樹栽培與奎寧製藥〉，收入范燕秋編，《多元鑲嵌與創造轉化：臺灣公共衛生百年史》，頁 79-128；張素玢，〈蟲蟲危機：海人草與臺灣的寄生蟲防治（1921-1945）〉，《多元鑲嵌與創造轉化：臺灣公共衛生百年史》，頁 129-176。

以帝國的角度研究金雞納樹的栽培，探討其在不同時段的發展，並檢視日治時期金雞納樹、奎寧與臺灣防瘧三者之間的關係。眾所周知的奎寧技術史是這藥物是從生物有機的產物變成化學物質，其全合成一直要到二次大戰期間才發展出來，儘管這期間陸續有抗瘧新藥物新藥，但仍必須與奎寧並用，因此原料金雞納樹的種植在 20 世紀前期都是各國的重要課題。日本是透過蘭學與明治後的西學傳入，日本的製藥者於 20 世紀發展出來萃取奎寧的技術也在殖民地臺灣取得具體的實踐。顧雅文這篇文章最特殊地方在於她探討日治時期的金雞納樹栽培，將時間拉長至 19 世紀日本對奎寧的認識。此外，她關注到金雞納樹是否栽種、奎寧是否生產，這牽連到日本帝國內外的政治、經濟與衛生情勢，因而研究視野不能只看臺灣。作者認為以往過於將這問題簡單因果化，認為金雞納樹的栽培與奎寧要藥的發展就是為了解決臺灣的瘧疾問題。

但事實是，與其說是官方的推動，不如說是田代安定的經驗與人脈才是這樹種在臺灣延續的關鍵。而明治 45 年後臺灣正式確立防瘧政策，才使得金雞納脫離經濟作物，成為不可取代性的防瘧特效藥原料。之後，一戰後的日本藥業自給的危機意識，也是得無法在日本藥用植物試驗場成功的金雞納反而在殖民地臺灣實現大規模的種植，因而確立臺灣在藥學上的重要地位。直到 1932 年，有鑑於國際政經局勢，金雞納成為國策作物，帝國政府主動要求殖民地臺灣推動這樹種的栽培。與此同時爪哇限制樹皮與樹苗出口的限制公布後，更刺激了官方在臺發展這事業的企圖。總的來看，顧雅文挑到一個好題目，講了一個相當完整的產官學三方面互動的好例子。

張素玢的文章〈蟲蟲危機：海人草與臺灣的寄生蟲防治（1921-1945）〉，則在探討日治臺灣寄生蟲病與驅除蛔蟲的情況，以及海人草與蛔蟲病治療的關係。文章看似是從疾病與環境的角度切入，但稍微細心一點的讀者應可看出這裡頭藥物開發與商業的關係。文中作者提到，1920 年後，驅除蛔蟲最常使用山道年與海人草。1918 年藤澤友商店與臺灣基隆的石丸庄助合作，前往當時為中華民國領土，隸屬廣東省的東沙島採集海人草，運往日本後以「富士海人草」名義上市，年銷售量達 20

至 30 萬斤，石丸成為這項商品的日本最大供應商。之後藤澤友吉商店，亦即是後來的藤澤藥品株式會社，發售蛔蟲驅除海人草藥劑 Macnin，是日本最早從海人草研發出藥劑的廠商。由於需求量大，各家藥商也紛紛推出類似商品，除了海人草，還發展出山道年或海人草與山道年的合劑。此後藤澤友吉製藥則與三井株式會社在報紙打起廣告戰。雙方將戰線提升到經濟戰的層次，主打呼籲日人要愛用國貨，藤澤友吉強調原料是來自日本近海的海人草，對抗外國輸入的山道年。

在以往，有關日治時期藥品與商業的研究，少有專論，目前僅見皮國立《當中藥碰上西藥》的通俗著作。劉士永的〈醫學、商業與社會想像：日治臺灣的漢藥〉是少數這方面的佳作。他受到美國歷史學者高家龍（Sherman Cochran）、Harold J. Cook、雷祥麟的研究影響，特別調消費文化的研究視角。劉士永舉高家龍的《中國藥商》的例子說明，正因為本地的藥商經常能夠以「在地化」的廣告手法，打動消費者的購買慾，進而創造出一個穩定的消費網絡，使得藥商和西方公司、消費者三足鼎立。該書的兩個關懷面在於，一是以西方為基礎的跨國藥業公司，能否不顧地方差異而同質化全球化的消費，二是西方以外地方是否只有跨國能向這些推動西方消費文化。

劉士永的問題意識在於漢藥科學化與科學中藥在臺灣社會該如何理解，一般民眾所賦予的各種想像又有怎樣的歷史淵源？這篇文章主要在釐清相關名詞「科學中藥」與「科學漢方」定義的基礎上，瞭解臺灣醫藥界研究中醫藥材的歷史，並探討科學中藥發展的文化與想像特質。劉士永認為，1930 年代之後，脫離了漢藥的臺灣漢醫學，從此之後無法找到適當的施力點，僅能憑漢藥材走入現代藥理實驗室中，或包裹科學的外衣成為民眾醫療經驗的一環。他並舉出實際例子，就是 1920 年代以來，日本科學漢方以民間成藥的方式，如女性滋補補品中將湯及咳嗽藥粉龍角散等席捲藥品市場，臺灣藥局與藥店架上販賣的藥品常可見這類商品。當時日本主要的藥品公司幾乎都有這類商品，並經常在廣告中以帝大或醫博科學研究、實驗證明有效等詞句來宣傳。此外，受到日本富山商人，以及科學漢方及成藥盛行所衍生的「掛藥包」賣藥行為，也漸漸成為戰前臺人醫療行為的

重要事項。一般藥品的藥價與診療支出，仍是患者選擇求診資源時的重要因素。

除了商業與醫療的關注重點外，有的學者則特別運用報刊中的廣告來進行研究。張仲民的研究則強調物質文化與商業文化，他對近代中國最重要的補腦藥「艾羅補腦汁」進行考察，嘗試分析在近代中國的身體建構過程中，以廣告為媒介的商業與消費所起的作用及意義。他不只關注廣告中的論述，還採取文化研究的分析技巧，分析廣告的敘事結構與修辭特色。和以往廣告研究者最大不同在於，他特別對廣告作者的背景作了許多考證，找出大量讀者及消費者對艾羅補腦汁及其廣告的回應資料。⁴¹

除了在醫療史的脈絡下關注以上課題外，有些學者則是「文化裝置」的都市史與消費文化角度觀看資生堂如何從一個製藥小店發展成日後的跨國藥妝事業。和田博文的《資生堂という文化裝置（1872-1945）》是這方面課題的傑作，醫療僅是書中關注一部分而非重點，但足以啟發我們如何進行藥的消費文化與全球史的研究。⁴² 資生堂如何吸收當時西方製藥的經驗進而轉而在地化成為日本品牌，之後向海外拓展的部分或許是日後臺灣史研究可以進一步探查的部分。像是 1920 年代的臺灣文人日記裡就常透露出到臺北的資生堂買藥的經驗。文青的一天除了休閒、購書、逛街購物外，醫療也是要事一件。像是新竹地方菁英黃旺成就提到會到東門町的臺北赤十字病院看病、照 X 光，或是到府中街的藥鋪資生堂買藥。

日治臺灣時期防治南京蟲的課題也是一個很好說明藥物、技術與商業關係的例子。1900 年的 10 月，臺北國語學校的宿舍及圖書館出現了大量的南京蟲，當時經由臺北監獄醫生的協助下，特地仿效監獄的作法，採取了在兩三日間集中驅蟲的方式。臺灣民眾和南京蟲「作戰」而引起火災的事情時有所聞。南京蟲帶來的困擾也曾引起鐵道部進而改善火車車廂的座椅設備。由於日治

臺灣的火車車廂分為三級，三等車廂坐的多為臺人，有鑒於臺人旅客大多有赤腳的習慣，不太注意整潔，並常攜帶折疊及藤製的物品，很容易成為南京蟲的傳染的溫床。鐵道部遂將布的座椅改換成磨造皮包覆的座椅，如此不僅方便用消毒水清潔，也易於打掃，較能降低南京蟲的繁殖及咬傷。

一直要到 1930 年代，臺灣社會才有了比較有效的防治方式。除了改善環境衛生之外，面對南京蟲的威脅，最有效的則是除蟲化學藥品的發明。當時最著名的是今津化學研究所開發出來的イマツ蠅取粉及イマツ芳香油。今津化學研究所的負責人是今津佛國博士，他所開設的這間研究所專門研發對付害蟲的藥物，像是蒼蠅、蚊子、跳蚤、蟑螂，其中又特別強調對南京蟲的效力。這些除蟲藥劑的發明大大改善當時臺灣社會的生活環境，漫畫反映了這樣的現象。

以上這幾個例子都可見到強調跨國、連結的重要性，尤其是這種運用報刊資料中的廣告來研究醫療史的取向，這些都是日後臺灣醫療史可以再進一步深入探討的部分。

五、結 論

這波醫療史的文化轉向與全球視野，的確開展了過往醫療史研究未曾關注的課題。雖然就西方史學史研究的光譜來說，文化轉向與全球史這兩者有前後發展的關係，不僅在時序上，也在研究方法。有學者就認為，文化史階段關注的面向，許多是微觀的，從下而上的，所研究的也比較破碎。相對來說，全球史則強調宏觀、連結、互動、合流、比較、長時間等等，因此是最新一波的史學發展。⁴³

然而，全球醫療史儘管強調跨國家、地域及疆界，但不必然就否認地方醫療史研究的重要性，這方面，已經有學者進行了思考。這種概念落實到現實研究中，我

41 張仲民，〈補腦的政治學「艾羅補腦汁」與晚清消費文化的建構〉，《學術月刊》2011.9: 147。

42 和田博文，《資生堂という文化裝置（1872-1945）》（東京都：岩波書店，2011）。

43 Gerog G. Iggers、王晴佳著，《全球史學史：從18世紀至當代》（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們可舉 Laurent Pordie 所編的當代世界中的西藏醫學的研究為例。《Tibetan Medicine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Global Politics of Medical Knowledge and Practice》這本書顯示了全球機制的視野無須犧牲對地方、鄉村實踐者的研究。全書所關懷的是全球的與地方的如何相互地塑造及產出。⁴⁴

當前的臺灣醫療史的研究已有一些課題比較接近本文所說的全球視野的研究取向，但二者並不能劃上等號，原因在於許多著作尚未以全球史的視角來看問題。儘管有些論著已經相當接近全球史的概念，但並未明白揭示這樣的詞彙，例如《多元鑲嵌與創造轉化：臺灣公共衛生百年史》一書。

總的來看，全球醫療史提供我們在研究臺灣醫療史時，許多可以參照的研究視野。第一，過往的國家疆界和國族主義的分析範疇與架構，已經無法讓我們有效地理解過去的歷史。全球視野的醫療史則讓我們跳脫了原本的民族國家史觀，改以更宏觀的角度探查跨國與跨文化的醫療問題。二，打破了中心與邊緣的概念。改從東亞的邊陲醫學經驗反省歐洲帝國中心；或以東亞生活方式對比歐洲文明病。⁴⁵其三，破除過往史學將西方醫學傳佈的過程描繪成現代科學「傳播與吸收」的過程的迷思。全球醫療史所強調的是將「帝國」納入思考，思考帝國殖民擴張的歷史脈絡。第四，唯有瞭解英美的傳教醫療活動，以及日本在東亞殖民地引介西方醫學過程中

扮演的關鍵角色，才能對東亞醫療史有深刻的理解。第五，過往僅將臺灣史、中國史、世界史分為三塊的學科劃分界線應當打破，醫療史課題有許多是跨國、跨區域的，唯有將視野放在比較、聯結、合流、空間轉向等全球史的特色下，才能理解近代東亞醫療史的特色。⁴⁶像是近來韓國學者申東源的《コレラ、朝鮮を襲う：身体と医学の朝鮮史》及川端美季的《近代日本の公共浴場運動》就很值得研究臺灣醫療史的讀者好好參考。⁴⁷

臺灣醫療史研究發展至今，近來已漸朝向文化史的取向前進，研究的課題有：疾病史、醫病關係、醫學社群、醫療與身體、健康與照顧、殖民醫療、宗教與醫療、醫療的物質文化、醫療與視覺、醫療與日常生活。在這些研究中，儘管已有文化轉向趨勢，但卻欠缺全球視野，相當值得學界繼續朝此方向努力。文化轉向後的文化史研究目前在西方已經進展了至少二十年，全球史則是最新的研究領域。儘管兩者並非完全取代的關係，但多少有以宏觀的研究方法修正過往文化史階段的微觀研究的不足。但兩者仍有許多重疊與整合的地方，像是前述所談的藥物流通與消費的部分，就是將文化史與全球史結合在一起的新趨勢。然而，並非所有臺灣醫療史的課題都能從全球視野切入，如何能像 Natalie Davis 教授所說，既要講一個精彩的在地故事，又要能凸顯出其背後的全球意義，我想是未來臺灣醫療史研究可努力的方向。

44 Laurent Pordie, ed., *Tibetan Medicine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Global Politics of Medical Knowledge and Practi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45 參見李尚仁的文章，〈健康的道德經濟：德貞論中國人的生活習慣和衛生〉，收入李尚仁編，《帝國與現代醫學》，頁223-269。有關中心與邊緣的討論，可見，Natalie Zemon Davis，〈去中心化歷史：全球化時代的地方故事與文化交流〉，《江海學刊》2013.3: 25-32。

46 Sebastian Conrad著，馮奕達譯，《全球史的再思考》（臺北：八旗文化出版社，2016）。

47 申東源著，任正嫻譯，《コレラ、朝鮮を襲う：身体と医学の朝鮮史》（東京都：法政大學出版社，2015）；川端美季，《近代日本の公共浴場運動》（東京都：法政大學出版社，2016）。這系列叢書還有醫師的社會史、健康的社會史、國民皆保險的時代、近代日本的醫療與患者。